

13

要 目

忆与庄希老相处的日子
抗战期间的福建省运输公司
辛亥革命前福州的教会学校和各类学堂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
厦门私立双十中学简史
福建同善社略述

第二十辑

福建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88

福建文史資料

第二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八八·福州·

主办单位 出版单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发 行 范 围 公 开 发 行

国内统一刊号 CN35—1053

价： 2.20 元

目 录

忆与庄希老相处的日子·····	张兆汉	(1)
抗战期间的福建省运输公司·····	胡时渊	(9)
我所知道的福建省运输公司和胡时渊 先生·····	萧 佛	(14)
抗战期间福建内地的电讯、电力事业 ·····	王能超	(18)
解放前侨汇业的片断回忆·····	陈涤明	(24)
福州罐头工业忆旧·····	郭怡诸	(28)
记福建新药联营公司·····	屠一道	(33)
福建造纸厂琐忆·····	任仲泉	(37)
漳州公路建设与汽车运输事业历史概况 ·····	蔡竹禅	(44)
林熊祥借款记略·····	钱履周	(55)
辛亥革命前福州的教会学校和各类学堂 ·····	郭公木	(64)
忆“旧电线书斋”·····	陈德金	(89)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 ·····	郭肇民	(95)
厦门私立双十中学简史·····	黄其华	(110)
鼓浪屿英华中学见闻·····	许声骏	(137)
福州(闽侯)旧小学教育的一些情况 ·····	李 艇	(154)
福州的戏场·····	杨湘衍	(170)
福建同善社略述·····	徐葆庆等	(193)
同善社见闻·····	王寿如	(204)

忆与庄希老相处的日子

张 兆 汉

1940年6月，我在香港有幸与庄希泉同志认识，从那以后，友谊日增，彼此交往近半个世纪，追忆前尘，往事犹新。

1940年夏，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又加紧了反共、防共活动，桂林风雨如磐，形势恶化，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党从可靠方面得悉桂系特务机关开列的文化界黑名单中，有3名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的同志。剧团党支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辅导员洪凌去河内躲避，另一辅导员陈轻絮去良丰朋友处暂避，我和施大德因做内勤工作，很少露面，留下坚持厦儿团和黄花岗纪念学校的工作。适第四战区参谋长、福建旅桂同乡会理事长吴石由柳州到桂林，召开黄花岗学校董事会会议，讨论派员去香港为黄花岗学校募集基金。吴石推举我去，我把此事向党的上级负责人李亚群、刘隆华夫妇汇报，他们认为机会难逢，同意我去。吴石、张贞遂写信给吴艺夫、张澜谿及福建旅港同乡会会长庄成宗，要他们予以协助。

我在港所事已毕，乃到鸭梨洲见厦儿团团员林莹聪。鸭梨洲是闽南人聚居的地方，厦门沦陷后，许多闽南人亦逃难来此。那时，寓居香港的庄希老正在鸭梨洲倡办建光学校，聘原厦门医院总务叶苔痕为校长。林莹聪因病未随厦儿团去越南，庄老乃把他留下，协助建校工作。我从林莹聪谈话中得知，庄老约我在九龙咖啡馆吃饭。我遵约到九龙咖啡馆，庄老正和莹聪在谈话。莹聪

站起来把我介绍给庄老，这是我认识庄老之始。他态度庄重，平易近人，诚挚坦率，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的同时，突袭香港。12月18日，日军在香港登陆，肆意抢掠烧杀，香港陷入了恐怖的氛围中。在此之前，庄老曾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和连贯等同志联系。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廖承志要尽快把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抢救出来。

一天深夜，庄老在鸭梨洲寓所与厦儿团的梁开明、林莹聪分析香港形势，认为应立即离港回内地。当晚，就分散撤离到香港市区暂避。几天后，日本情报机关人员及台湾、高丽浪人到庄老寓所，名为拜访，实为邀迫他出来搞伪维持会。庄老决定马上离港，以免陷入日敌陷阱。12月下旬某日，庄老带着他的弟弟庄朝俊、妹妹庄妙妙和香港知名牙医张国荣、台湾同乡刘启光、庄成宗的孩子、以及梁开明、林莹聪等人，雇一小船，化装难民，乘深夜冒着生命危险，在闪烁的探照灯光和时疏时密的机枪声中，闯过不准通行的海峡，抵达九龙市区。随后，不顾疲惫，简装潜行，攀越崎岖山道，穿过偏僻乡镇，混在大群难民中，经过3天跋涉，到达文锦渡。在港澳交界处的日军营地，所带的轻便行李被逐件搜查。抵海陆丰后，改乘小船经韶关辗转到了桂林。

1942年1月初，庄老一行在薄暮中由梁开明引到黄花岗纪念学校。彼此相见，兴奋莫名。那天很冷，大家聚在厨房里，边烤火边听庄老他们讲述沿途逃难的情景。随后，由我安排他们住在附近的旅馆。

当时桂林因敌机经常袭扰，城里居民疏散乡下，空余房屋很多，庄老便与由港逃难来桂林的前厦门海军航空处处长陈文麟夫妇合租平房数间居住。不久，搬到桂北路与从昆明来的王雨亭先生合住。（王是菲律宾侨界知名人士，与庄老是忘年之交，九一八事变后两人在菲律宾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抨击国民

党的不抵抗主义。为此，庄老后来返厦门省亲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经庄老介绍，林莹聪到聂耳的哥哥在柳州开设的银行当了秘书（林因病去世时，庄老曾赴柳州办理其后事）。在桂林期间，庄老交游甚广，凡游泳、柔道、书法等活动，均有涉猎。

1942年，中共南委被敌人破坏以后，叛徒郭潜带特务到桂林，逮捕了桂林市委青年委员梁耀宝。梁被捕后叛变，出卖了组织，还当上了特务。7月9日，省工委副书记苏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和工委交通员张海萍在逸仙中学被捕（苏、罗、张被捕后，坚强不屈，最后英勇牺牲）。10日晚，梁耀宝带特务到盛家园抓广西工委书记钱兴，幸赖房东盛某夫妇掩护，钱从后门逃脱，连夜到灵川萧雷家里躲避，得知彭维之被捕当了叛徒。广西工委就这样断了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当时，庄老的儿子庄炎林在广西大学读书，是中共广西大学支部书记，“7·9”事件后，得组织通知，从广西大学撤出，任省工委交通员。1943年，他奉省委之命，急筹一笔款，以供转移和安排处于险境的同志。炎林就此事跟庄老商量，庄老说：我从香港逃难以后，身边的钱已所剩无几，只是香港还有部分资产，可以设法变卖。庄老决定自走一趟。于是，率炎林、张应仁等从湛江经澳门到香港，用船将存留在香港的全部动产运回内地拍卖，把拍卖所得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庄炎林从香港回来后，对钱兴同志说，他父亲有个比较密切的朋友，名叫张兆汉，正住在桂林，是《广西日报》记者，可能是我们党的同志。一听到这里，钱兴就说：“张兆汉，我认识呀！他原是厦门的地下党员，厦门沦陷后，他带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到香港、越南一带做抗日宣传。不知他现在党的关系还在不在，跟上级有没有联系？”钱兴叫炎林和庄老商量，请庄老转告，说他要找我（我和钱兴是1938年在厦门认识的）。一天，庄

老来《广西日报》社找我，对我说：“厦门一个名叫简朴（钱兴的笔名）的希望和你见面。”我这才知道钱兴已由闽西南调到广西来了。庄老还说：炎林把“7·9”事件简单告诉我，希望你的组织把它转报上级。我将情况报告了李亚群同志，李指示：1，组织上同意把“7·9”事件转报中央；2，向他们传达中央最近指示精神，特别是对全国抗战形势和对广西局势的分析；3，今后两方面一般不发生横的关系，倘有特殊和重要的问题，你们提出，我们转报中央。过了一段时间，等你们安排就绪以后，请你们到重庆找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联系。

1944年庄炎林到了柳州，我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抗战形势有了较大的变化。日寇正力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完成其战略部署，广西即将沦为敌后。党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和组织抗日武装斗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应随形势作适当改变。在这之前，庄老为了与钱兴和庄炎林密切联系，一度到阳朔居住，其住处成为党的联络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将台澎列岛收归祖国。吴石以福建旅桂同乡会名义，召集座谈会；研究“闽台协会”筹备事宜。这时，曾参加十九路军福建事变的陈碧笙、王雨亭由昆明来到桂林，他们知道庄老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后就因积极联合爱国人士，开展反日爱国运动而被日本驻厦领事馆押送台湾监禁了9个多月；抗战爆发后从马尼拉移居香港，一面主持“闽台抗日救亡同志会”，一面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影响遍及桂柳昆渝的闽、台同乡，遂向吴石推荐，让庄老以闽台协会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座谈。据我所知，当时，在桂林的张贞、林素园、曾希亮、叶采真、宋斐如、林若谷、陈文麟、张国荣，在柳州的陈荣芳、陈肇基、吴玉琛、雷鉴卿，在重庆的刘启光、胡守愚、朱善彰、刘成鹏、周士观等，都参加了闽台协会的筹备工作。我也以记者身份在桂林参加活动，从中开展统战

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庄老和吴石、陈碧笙、王雨亭等离开重庆他往，是以闽台协会一直没有正式成立。

1944年秋，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长驱千里，侵犯湘桂路，大片河山沦于敌手。庄老在兵荒马乱之际，由桂林搭火车来柳州。他和我商量，要我爱人陈冰和他的妹妹逸梅跟他先去重庆，并说我若在柳州有事要办，可随后搭商车去。那时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涌向车站，平常只能容纳四五十人的三等车厢，这时变成猪栏一般。不少难民搭人梯，爬窗口，蜂涌而上，在车里挤不下，就爬上车顶。不料火车过隧道时，连人带行李都被扫落下来，血流遍地，惨不忍睹。

当时国民党部队借口焦土抗战，日寇还在柳桂之间，他们就把桂北重镇金城江放火烧掉。从独山撤出时，不顾公路上正走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用地雷把公路桥梁炸掉，死伤者不计其数。美军飞机又误炸都匀，尸骸枕藉，填街塞巷，造成另一场灾难。柳州到都匀不过三四百里，但火车时开时停，甚至三四日不动，竟走了二十余日。庄老他们饥寒交迫，流离转徙，历尽千辛万苦，事后提起当时备受折磨的情景，还感叹不已。

在柳州告急时，我的上级联系人左洪涛同志把我的组织关系介绍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事妥后，我和《大公报》记者曾敏之一起搭商车离柳州赴都匀，在那里和庄老等会齐后一起到了贵阳。那时厦儿团一部分团员许岱君（党员）、王愍生、叶耀来、周定南、林毓瑞等由桂林逃难到贵阳，我从庄老和王雨亭处弄来一笔钱，让他们在贵阳办美术社，以解决生活问题（以后日军续攻桂黔路，独山、都匀告急，他们去了昆明，我则去了重庆）。

在贵阳，抗日救护队的陈希民医师（与庄老是世交）曾约庄老吃饭，并请我作陪。那时，庄老还偕我及我的莆田同乡刘成鹏、王立民等人，造访了欧元怀先生（莆田人）。欧1924年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因与学校当局意见分歧，愤而辞职，和王毓祥、

林天兰等赴上海筹办私立大夏大学。那时庄老在厦门，曾激于义愤，联合各界人士予以同情。这次相见，两人都不胜感慨。

我在贵阳住了两星期，就和庄老先后离贵抵重庆。那时重庆正闹房荒，陈冰和逸梅只好住进旅馆，我则在旅馆的过道搭行军床。

在此之前，我持左洪涛同志介绍信到夏衍家里。夏衍因昨晚在红岩参加晚会，睡未起床，他嘱我到曾家岩周公馆找徐冰同志。徐要我到红岩找荣高棠同志接洽。在那里，王若飞同志与我谈话，要我作书面汇报。因我没有与陈冰打招呼，庄老不知我去哪里，后到夏衍家里，知道我在红岩，他们才放心了。

庄老到重庆以后，租缅甸华侨许文顶半爿店铺开设“建光行”（经营电石）。我和庄老商量，以该行为党的联络站，我与梁开明分别以该行副经理和店员的公开身份掩护工作。

在重庆期间，庄老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与各方面人士多有接触。如1945年10月周恩来同志应西南实业协会之邀，出席他们的星五聚餐会，就当时经济形势讲了话。庄老、胡守愚、林汝良、刘成鹏、王立民、林珠光、陈冰、梁开明和我都曾在座听讲。11月8日，重庆10团体发起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

（庆祝陈嘉庚由印尼乘飞机安抵新加坡）。大会盛况空前；有500多人到会，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都参加了大会。毛主席送了一幅单条，周恩来、王若飞发来祝辞，冯玉祥送了一首贺诗。郭沫若代表文协讲话，场下掌声雷动。柳亚子先生刚上台讲话，混在会场中的国民党特务就起哄捣乱，与会者纷纷站起来制止，迫使他们逃出会场。庄老、王雨亭、刘成鹏、林汝良、胡守愚、林平风、梁开明和我也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庄老在重庆除参加闽台协会的筹备工作外，与许文顶、陈荣芳、王雨亭、戴愧生、林珠光、庄明理、刘启光等人及新加坡傅无阙之子、陈嘉庚之子时相过从。原厦儿团的沈永时由芷江来重庆时，

我还从庄老处拿10万元给他夫妇做盘缠。此外，与庄老经常接触的还有从缅甸到重庆的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胡进迈、许涤新等。

抗战胜利后，党指示我跟庄老商量，要他去厦门重建厦南女子中学（该校是庄老和夫人于1922年创办的）。他说厦南女中校舍已在厦门沦陷期间被敌拆毁，无意去厦重建。不久，他去了上海，我则应湖南省政府吴奇伟的堂弟吴启燕之邀去长沙《国民日报》社任经理。

后来，夏衍同志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将在抗战时期活动在南中国的抗战演剧队的第五队和第七队由广州带到香港，组成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赴南洋各地开展新兴艺术与青年运动，以配合国内的民主运动。他们先到曼谷演出，然后取道马来亚到新加坡。那时我在香港，党组织要我写信给在新加坡的庄老，要他就近帮助办理入境证。后来我到新加坡时，庄老还在“巴刹”请我吃饭。

这时夏衍应胡愈之之邀，由香港来到新加坡，任《南侨日报》主笔。夏公在重庆时与我相识，他要我写文章在报上发表；胡老要我在《风下》杂志开辟一个名为“青年自学辅导社”的专栏并负责编辑；而庄老却荐我任某中学高中二年级教员。庄老那时开设“捷通行”，经营苏联电影和国产电影及汇兑代理业务，庄老任董事长，刘成鹏、傅乃超为正副经理。那时，赵渊由昆明来新加坡，任华侨中学教员，吴荻舟、力丁在育英中学，陈碧夫、陈冰等在小学任教，林平风在南洋女子中学任教，他们都常和庄老往来。后来，饶彰枫同志由港来新，筹办新华通讯社新加坡分社，我任经理兼《新华周报》督印人。分社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政策，在宣传解放区光明政治的同时，有力地揭露了蒋管区的黑暗统治，从而扩大了我党在南洋华侨社会的影响，推动了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新加坡期间，饶彰枫和我还曾先后通过庄老的关系，到怡和轩俱乐部和陈嘉庚

先生亲切会面，向他介绍国内情况，阐述中共的主张和政策，对我们说的话，嘉庚先生都表示赞同和理解。

1948年英政府颁布紧急法令，新加坡当局派员到国际书店二楼新华通讯社新加坡分社检查，拘捕了我和社中的另二个人，经我抗议，24小时后始予释放，但勒令我们“自由出境”。出境前，亲友不敢和我接近，只庄老在新加坡胡文虎的虎豹别墅设宴为我饯行。

离开新加坡后，我到了香港。1949年2、3月间，庄老由新加坡来到香港，在我家住了一个月。那时，我任华南分局直属福建特别支部书记，组织“新民主福建建设委员会”（简称“闽促”），庄老、庄成宗、黄长水、王雨亭、张楚鸣、郭徵甫等均加入。同年9月，庄老得周总理电示，专程从香港到新加坡，面邀嘉庚先生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成立，庄老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

解放后，我每年参加全国统战会议，庄老都邀我到华侨大厦或他家里吃饭，或小酌或饮工夫茶。1982年，94岁高龄的庄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一天，炎林打电话给我，说这天是他父亲95岁生日，家人为他祝寿，邀我参加。我握着庄老的手，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并以无比欣奋的心情写下一首诗：

夤缘港九识荆州，千里转徙漓水游。

三度拘囚宁玉碎，倾家纾难亦奚畴。

望门投止海天日，鬢铄廉隅孺子牛。

百岁期颐祝寿考，极目神州统一楼。

1988年5月12日，庄希老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走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他虽永离我们而去，但他“永爱中华志不渝”的高尚情操永远令人崇敬，他为祖国、为人民所建树的业绩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抗战期间的福建省运输公司

胡 时 渊

福建省运输公司成立于1938年8月（设于南平），是继福建省贸易公司之后成立的又一个官僚资本机构。运输公司的董事长由省建设厅厅长徐学禹兼任（徐还兼省银行、省贸易公司董事长），我任公司总经理，戴秋农、任家昆、钱仲麟任协理。现就记忆所及，将运输公司成立后所做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分述如下：

1. 军、民运分开和收购私营公司

国民党统治时代，各种运输都以军运为先。因此，许多军事机关常以军运为借口，向运输单位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大家叫苦不迭。福建多山，道路崎岖，养路护路工作又做得不够好，再加车辆因维修不善经常失灵，运输中断现象时有发生，军事机关为此而经常找公路运输部门的麻烦。于是徐学禹建议将军运与民运分开，军运由军事后勤部门负责，民运由省运输公司办理。当军运与民运分开之初，省运输公司一次拨给军事后勤部门20辆雪弗兰货运新车（载重1.5吨，省贸易公司新购），专供省际军事运输之用，并言明如有不足，可再向运输公司租用。

军、民运分开后，即着手收购福（州）泉（州）厦（门）公路各段原有的私营运输公司，将其改为公营。收购办法是，所有站务人员和司机均并入福建省运输公司继续任用，并支付工资和伙食费，车辆经作价后，分期偿还给投资人。此事自1938年秋开

始办理，进行较为顺利，有7家私营运输公司并入了省运输公司。

2. 整顿车辆

为改变车辆管理的混乱状态，运输公司甫成立，就将客货车按车型和种类区别开来，而后一一进行修理。并组织人员察看各公路沿线地形及路面陡平度情况，就各种不同情况分别相应车型行驶，以策安全。对各车用油（柴油、汽油、机油）的储备也做了规定，总以适度为宜，不使浪费。鉴于当时油料来源困难，还将司机和修车机匠按其籍贯，分为福州籍、闽南籍、闽西北籍及外省籍，叫他们把车辆停在家门附近，这样，既可以节省油料，又便于就近照料，他们也愿意这样做。

3. 克服困难 保障油料供给

福建地处前线，各海口都被敌舰封锁。福泉厦公路的泉州至厦门一段，为了减轻日军南侵的威胁，我方已将其破坏；福州至泉州一段，也随时有被破坏的可能，所以油料的来源十分困难。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省运输公司便与该公司驻上海的负责人联系商量，决定由上海方面自行雇用外籍浅水小轮装运汽油30万加仑（以6000只铅皮桶装贮，每桶50加仑）至福建涵江，以资储备，分年应用。当时，马勒（Moller）轮船公司有一小型客货轮，排水量约300—500吨，专门航行于上海、涵江间，省运输公司包租此轮专运汽油和少量机油，其手续由华尚文同志（时任中国旅行社总务主任）经办。当轮船进入涵江时，省公司派樊缉虎携一电台前往指挥，限3小时内，将6000桶汽油全部卸入港内浅水处，并吩咐小轮船从速离开，返回上海。卸货甫毕，即有日机飞临涵江港口侦察，以该处无何动静，盘旋片刻离去。于是由闽江轮船公司将油桶从海水中捞起，分批运至各指定地点，未受任何损失。

1941年，抗战进入第4年，日舰对福建沿海大小港口的封锁

更形严密，外轮无法驶入，进口油源中断。这时，协和大学毕业的林一、倪松茂两人主张以松树砍伐后的树根炼油，并试制成功。省运输公司便成立炼油厂，聘林、倪二人主持其事，资本共计法币20万元，设总厂于建瓯。同时，为了便于收购和运输，沿闽江选择适当地点，设置粗油炼油场若干处，并向农民收购松树根（每斤作价1分，闽北人民亦乐于挖掘出售）。由于在制造过程中注意改进方法，松根汽油的质量不断提高，经过多次检验，证明其挥发性能良好，对车辆的机械没有腐蚀或其他损害性作用。自1942年起，炼油厂每月可产松根汽油1万加仑，已能够满足省内全部行车的需要，所以抗战期间，福建省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油荒。就当时情况来说，能够做到这点，确属很不容易了。1946年，以外商汽油进口恢复，该厂乃宣告结束。

4. 购入汽车零部件 统筹全省修理用料

抗战初期，省运输公司在上海购买了一批福特汽车的原箱底盘，委托外轮运抵本省各港口（当时，只有涵江和三都澳两处较为安全）。为防止日机空袭，货物运抵后，公司派员把木箱打开，将汽车底盘的零部件一一拆散，由农民或肩负或扛抬至公路的安全地带，然后由机匠装配成车，驶至各车厂，供作客货运输之用。

除购入原箱底盘外，省运输公司还与省银行洽妥，由省银行出钱，省运输公司负责购储汽车的其他零部件。零部件运抵后，由省银行指定存储在省运输公司的材料库内备用。省运输公司或其他运输公司需用以修理车辆时，可向省银行付款，而后凭单向材料库提取。战时经济困难，且物资供应匮乏，汽车零部件不易购得，这样做，可以免除各运输公司零星采购和分别储藏之劳。因此，各运输公司和省银行都认为这是一种两便两利的好办法。

5. 整顿闽江航运

闽江轮船公司是闽江（福州——水口——南平）唯一的水上

运输机构，但由于船只分散管理、航运各自为政，柴油、机油来源缺乏（有油就开，无油就停），及资金无法筹措等原因，形同一盘散沙，几濒破产的边缘。我要求该公司在有秩序情况下改组。改组后，公司经理林君扬与我协商，为了维持闽江的正常航运业务，由省运输公司借给轮船公司法币5万元和燃用柴油10吨，轮船公司向运输公司借调机务人员（萧阴普、石震欧）和会计人员（先后为邹光正、胡哲松），帮助整顿业务。闽江轮船公司改组后，航运业务渐趋兴旺发达。

因闽江上游河道狭窄，水急流湍，各民船（约有30多艘）的业务日趋萎缩，有无法维持之势。省运输公司有鉴于此，遂与省粮食局、省盐务局商量，将粮食和食盐委托各民船承运（由南平至浦城运盐斤，由浦城至南平运粮米），此举维持了数百船民的生活。同时，在船民过夜的沿江埠头设立讲书摊，免费专讲《水浒传》，使船民得到正当的消遣，减其从事赌博等不健康活动之可能。

6. 开辟闽渝直达车

福建与重庆间的邮件和人员往来，原来都需从上海或鹰潭转行，颇为不便。1939年，省运输公司拨出客车，直接来往于南平与重庆之间，并与西南公路管理部门洽妥，当客车在西南地区公路行驶时，请他们给予加油和修理的便利；并与中国旅行社洽商，请该社沿途的各招待所为旅客的过夜住宿提供方便。直达车起初每月对开一次，后增至每月三次，颇受旅客欢迎，甚至有人专程由上海来到南平，然后搭直达车前往重庆。

7. 抢运闽茶出口香港

战前，福建是茶叶出口数量较大的省份，战时，由于敌人的封锁，出口锐减，省财政收入因之大受影响。为此，省茶叶管理局局长庄晚芳及副局长陈德坤就茶叶出口事宜与运输公司协商办法，决定由运输公司派领江人员林杉杉潜赴上海，与该公司驻上

海的负责人华尚文商议，向英商马勒公司包租一艘货轮，由林杉杉在上海登船，将货轮引进福建三都澳港；同时调集三都澳港口所有的民船船员前往茶仓装运箱茶，一俟外轮到港，立即从两边舱口同时装茶上船，随即运往香港。此次行动，严守秘密，进行也很顺利。结果，一批为数不少的箱茶运抵香港，卸存在英国人的栈房内。接着，福建省财政厅厅长严家淦亲往香港，与有关商号人员结算箱茶帐目，得款港币400多万元，弥补了省财政的不足。